

全新修订版

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

王阳明

大传

中卷



[日] 冈田武彦 著

杨田 冯莹莹 袁斌 孙逢明 译

钱明 审校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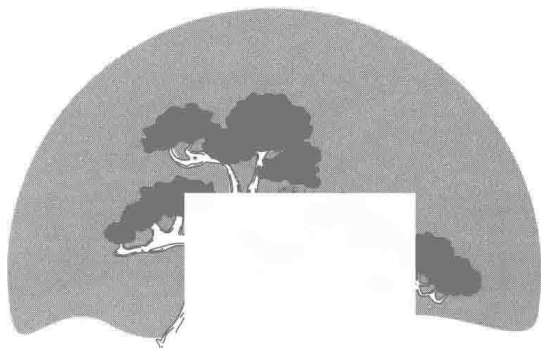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新修订版

王阳明大传

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

中
卷



杨田 冯莹莹 袁斌 孙逢明 - 译

钱明 - 审校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中卷



第九章 | “知行合一”说

席元山入门·····	002
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·····	005
行而知之·····	008
如何修行“知行合一”·····	011
“知行合一”说的发展·····	014
学问即行，行即知·····	019
致良知·····	022
陆九渊与“知行合一”说·····	025

第十章 | 庐陵知县

天诛宦官刘瑾·····	028
龙场之后·····	030
阳明评“静坐”说·····	036
卧治六月·····	041
吉安的王明遗迹·····	045

第十一章 | 京师讲学

和黄绶谈立志·····	050
“明镜”论·····	057
众多门人聚学·····	065

送别方叔贤·····	069
送别湛甘泉·····	073
送别黄绾·····	077
阳明的出世倾向·····	082
“朱陆同异”论·····	084
“未发已发”论和“体用”论·····	092

第十二章 | 滁州讲学

与徐爱论学·····	098
《大学》学什么·····	102
由诚意到格物·····	112
心学的三大学说·····	119
儒学的三大论题·····	123
敬王通而轻韩愈·····	128
不妄议经书，不提倡著述·····	133
与门人游四明山·····	137
会晤了庵和尚·····	142
训诫弟子：理气之辨·····	154
到滁州上任·····	156
批评王嘉秀，开导王纯甫·····	169
离开滁州·····	174

第十三章 | 南京讲学

门人故交齐聚学·····	178
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·····	183
一定要在事上磨炼·····	185
立诚是根本·····	188
立志为培根之学·····	193
劝谏武宗迎佛·····	201
奏请停职休养·····	209

第十四章 | 南赣戡乱

巡抚南赣汀漳·····	212
破流寇，抵赣州·····	220
探贼情，定战略战术·····	226
平定漳州贼匪·····	234
体恤民情，注意农时·····	243
征剿南赣三贼·····	254
一篇告谕的作用·····	261
喜得贼巢地图，奇袭横水·····	268
一日尽破桶冈贼匪·····	273
智取浰头贼首·····	278
征剿浰头贼众·····	285

奏请辞官·····	291
教化当地百姓·····	295
奏请设立和平县·····	303

第十五章 | 赣州时代

徐爱之死·····	308
畅游通天岩·····	316
期待归隐生活·····	322
赣州讲学·····	330
再论为学头脑与“立诚”·····	335
刊刻《大学古本》·····	340
由“诚意”说到“致知”说·····	346
《大学古本旁释》·····	353
刊刻《朱子晚年定论》·····	356
刊行《传习录》·····	364



『知行合一』说

席元山入门

002

前文已述，正德四年（1509），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因久仰王阳明的大名，特意前往王阳明的住处，向他请教学问。

席元山（1461—1527），名书，字文同，号元山，四川遂宁人，弘治三年（1490）进士，后升任礼部尚书，嘉靖六年（1527）又加封为武英殿大学士^①。六十七岁去世，谥号“文襄”。席元山非常推崇陆学，曾著有《鸣冤录》，为陆学辩解。在晚年时曾推举王阳明出任大臣。

据《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》记载，席元山对宋明理学非常感兴趣，他把王阳明迎请到自己的住处，向王阳明请教“致知”和“力行”究竟是一层功夫还是两层功夫。王阳明告诉他，知行本自合一，不可分为二事，也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席元山非常钦佩王阳明，特地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，还亲率贵州诸生向王阳明行弟子礼，而且一有空暇，就会前来听讲。王阳明也借此机会，在贵阳大力提倡“良知”说。

^① 武英殿大学士：是朝廷的顾问官，当时位列六部之上。

但“良知”说是王阳明在晚年提出的，他在贵州时根本就没有提过“良知”说。《阳明先生年谱》中记载：“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，问朱陆同异之辨。”

席元山后来又著有《鸣冤录》，仔细想来，该文应该是根据《阳明先生年谱》中记载的这次辩论而作。

接着《阳明先生年谱》又记载道：“先生不语朱陆之学，而告之以其所悟。书怀疑而去。明日复来，举知行本体证之‘五经’诸子，渐有省。往复数四，豁然大悟，谓‘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；朱陆同异，各有得失，无事辩诘，求之吾性本自明也’。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，身率贵阳诸生，以所事师礼事之。”

总而言之，席元山师从王阳明之后开始意识到，与其讨论朱陆之异同、明辨古人之是非，倒不如判明自己内心的是非。至于王阳明当时悟得的“格物致知”究竟是什么，席元山又是如何理解的，王阳明提出的“知行合一”说究竟包括哪些内容，席元山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，《阳明先生年谱》中一概没有记载，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。但是，我们可以从王阳明与门人徐爱后来有关“格物致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的问答中，推测出王阳明和席元山交谈的大致内容。

王阳明没有按照席元山的提问去回答朱陆之说的异同，而只是谈了自己所悟到的“格物致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说。对席元山来说，如果能领悟到“理”存在于“性”中，那么朱陆之异同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明了了。所以说，王阳明虽然看起来没有回答席元山的提问，但其实已经回答了。

王阳明开口评论朱陆之异同，并且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见，那是后来的事了，后文将对此予以详细介绍。后来，由于弟子们就朱陆同异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，王阳明没有办法，只好站出来，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朱陆同

异的想法。

那么，王阳明在贵州时为什么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呢？

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。其一，王阳明觉得与其争辩古人做学问的是非，还不如先去体悟圣学，以求得“吾性”；其二，当时朱子学风靡一时，如果大力宣扬陆学的话，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所以，为了避开锋芒，王阳明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。

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

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王阳明不得不加入朱陆同异的辩论中。虽然表面上朱子学盛行一时，人们却不能否认陆学潜藏的事实。自元朝中叶开始，朱陆同异的辩论就已经出现，王阳明自然也不能摆脱这一风潮。

后来，朱熹的高徒陈淳^①极力排斥陆学，再加上朱子学比陆学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，所以在陆九渊去世之后，朱子学便逐渐兴盛起来。陆九渊有四大高徒——沈焕^②、舒璘^③、袁燮^④和杨简，人称“四明四先生”或“明州四先生”。陆九渊死后，他的四大高徒在浙江四明（今宁波）地区讲学，所以陆学主要在四明地区留存下来。由于受陈淳排斥陆学的影响，陆学一蹶不振，逐渐陷入衰败。至元代，朱子学被指定为科举之学，迎来了

① 陈淳（1159—1223）：字安卿，亦称北溪先生，漳州龙溪（今福建龙海市）人，南宋理学家。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，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和阐发者。

② 沈焕（1139—1191）：字叔晦，世称定川先生，南宋哲学家。

③ 舒璘（1136—1199）：字元质，一字元宾，奉化广平（今宁波奉化区）人，人称广平先生，南宋乾道八年进士，授四明郡学教授。

④ 袁燮（1144—1224）：字和叔，浙江明州府鄞县（今宁波鄞州区）人。师从陆九渊，学界称絜斋先生。

大繁荣，而陆学基本上仍处于隐藏不露的状态。

朱熹和陆九渊死后，虽然朱子学派极力排斥陆学，但是陆九渊的心学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朱子学。这一过程类似于宋代儒学中的“形而上学”和“心学”的形成与发展。在宋代，当时的儒学界也极力排斥禅学和道家之学，却不知不觉地受它们的影响，最终形成了儒学的“形而上学”和“心学”。朱熹的再传弟子、著名大儒真德秀^❶可能也是因为受陆学的间接影响，所以才创作了《心经》，论述了从古至今的心法。自宋末一直到元代，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朱陆二学殊途同归的看法。

元代朱子学的大儒吴澄认为，陆学主张的是“尊德性”，朱子学主张的是“道问学”，二者同等重要，没有轻重之分，所以吴澄也被认为是陆学派的儒学家。后来，思想界又兴起了朱陆同异的辩论。元末的赵东山、明初的程敏政认为，虽然朱子学和陆学存在差异，但它们所追求的结果是一致的。朱子学没有忘记“尊德性”，陆学也没有忘记“道问学”。尽管朱熹在年轻时和陆九渊的立场相异，但是晚年他和陆九渊的立场趋于一致。

到明代后，朝廷更加重视朱子学，不仅将其指定为科举之学，还打压提倡陆学的人士，从而在表面上形成了朱子学兴盛、陆学悄无声息的气势。但是实际上，不少明朝大儒已经把“心上”功夫当作自己做学问的要旨，出现了重视心学的倾向。朱子学和陆学在暗地里相互接近，相互影响，最终出现了一位专门提倡心学的朱子学者——陈献章。

清初大儒黄宗羲把陈献章的心学视作阳明学的先导，但陈献章的心学是“主静心学”，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是承继陆九渊，是“主动心学”，二者

❶ 真德秀（1178—1235）：字景元，后改为希元，号西山，世称“西山先生”。

的方向明显不同。陈献章的心学沿袭的是朱子学，因此可以说是“宋学”，而王阳明的心学沿袭的是陆九渊的心学，因此可以说是“明学”。这也恰好体现了宋代精神和明代精神的差别：一个主静，一个主动。

如果能够领悟到“致知”和“力行”的本体是统一的，那么理解“知行合一”说就会变得很简单。如果不是通过这种“体认”，而是单纯地依靠理论去解释“知行合一”，理解起来就会很困难。王阳明曾经从各种角度论证过“知行合一”说。综合起来看，经他阐述，“知行合一”说的实质已经变得非常明晰了。

在王阳明看来，如果能够体认到“知行”的本体，那么“知行合一”说就很容易理解了。王阳明晚年时认识到“知行”的本体就是“良知”。这样一来，“知行合一”说就变得更加具体了。但是王阳明所说的“良知”，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知识让人们去理解的，而是需要人们深切“体认”的。“知行合一”说是王阳明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予以详细介绍。

行而知之

008

王阳明提出的“知行合一”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

自古以来，虽然众人皆知“知”与“行”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，但一直都是将二者分开，各自论述。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时代，对“知”与“行”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微。朱熹曾提出“先知后行”说，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，然后才能去实践，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。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，是绝对的真理。

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，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，众人不能理解其本意，甚至惊愕，也是很自然的。被称作“王门颜回”的王阳明的高徒、妹婿徐爱，一开始听到“知行合一”说时，也流露出惊讶的表情。

总的来说，长于理性的人会很难理解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本意，这和长于智慧的子贡无法理解孔子的“一贯之道”^❶是一样的道理。无怪乎孔

❶ 一贯之道：出自《论语·里仁篇》中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“一贯之道”即尧舜之世合理社会秩序的依据，也即“道统”。

子会对子贡说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孔子告诫子贡“道”并不是用道理就能说清楚的。后来，长于德行的曾子继承了孔子的“一贯之道”。曾子比子贡“鲁”，即我们所说的愚钝。当孔子说出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时候，曾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字——“唯”。所以说，子贡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，否则他应该理解孔子的“一贯之道”。与此相反，虽然曾子被视作愚钝之人，但他其实并不愚钝，不然怎么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谛呢？又怎么能参透“一贯之道”呢？

总之，长于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会陷入偏见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，朱子学都是“主知主义”^①的学说。因此，在一个朱子学至上的时代，人们必然难以理解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。

徐爱最初也难以理解老师的“知行合一”说，所以曾与自己的同门师弟黄绾和顾应祥^②展开辩论，试图去理解“知行合一”说的主旨，但是一直未能如愿，最终不得不直接向王阳明请教。（《传习录》上卷）

先生曰：“试举看。”

爱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、兄当悌者，却不能孝、不能悌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可行者。知而不可行，只是未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

① 主知主义：亦称主智主义，是西方近代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思潮，主要代表为德国的赫尔巴特。主知主义德育观与中国传统的权威主义道德教育观截然不同，它张扬人的道德思维、道德理性、道德智慧及道德主体意识。

② 顾应祥（1483—1565）：字惟贤，号箬溪，祖籍长洲（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），王阳明的弟子、思想家、数学家。明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进士，正德三年（1508）授江西饶州（今江西鄱阳市）推官。

那本体，不是着你只恁地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’。

“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

“就如称某人知孝、某人知悌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、行悌，方可称他知孝、知悌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悌。

“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

“圣人教人，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！如今苦苦定要说道知行做两个，是甚么意？某要说做一个，是甚么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？”

王阳明从“知觉与好恶之意是一体”以及“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”的立场出发，对“知行合一”说进行了阐释。

毫无疑问，“好恶之意”其实就是“行”。明末大儒刘宗周也非常重视“好恶之意”，并且将“诚意”视作自己做学问的宗旨，认为“意”非“已发”，而是“未发”，并将“意”视作“心”之本体。